

讀金基赫著「東亞世界秩序的結局： 一八六〇—一八八二間的朝鮮、日本 、及大清帝國」

張 存 武

去年（一九八〇）美國加州大學出版部刊出了戴維斯加州大學（California University at Davis）教授東方語言及文化的金基赫先生（Key-Hiuk Kim）所著 *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Korea, Japan, and the Chinese Empire, 1860-1882* 一書。這書名無疑是自費正清編的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演化而成的。我本想將 *East Asian World Order* 譯為東亞舊秩序，因為這四個英文字乃指明清兩代行於東亞的封貢國際關係制度，此制比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日本人提倡的東亞新秩序，及二次大戰後的東亞現局，都為古老陳舊。

為了讓讀者對本書內容有一大致輪廓，現在先將其章節條述於下。書共九章。首章安排本書的基礎：朝鮮與中國、日本的關係，即事大交鄰，及其排斥日本、西洋思想的根源。第二章陳述一八六六年法艦，一八七一年美國武裝商船對朝鮮的侵擾，及中韓的反應。第三章以江戶幕府末年日本的征韓論為中心，論證日本對東亞大陸擴張思想的復活。第四章討論日本明治維新至一八七一年間對中韓外交政策：改變日韓已存關係制度，利用對韓關係解決內政問題，及中日條約的締結。這是取得與中國平等地位以壓制朝鮮。第五、第六兩章研討一八七二至七六年間日本師法西方帝國主義，以敵艦政策推行擴張主義。具體內容是日本企圖改變與西方所訂不平等條約，一八七三年的征韓辯論，迫使琉球不再朝貢中國，征臺灣，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第七、八兩章研究中國勸告、主持朝鮮與美國訂約，以及由此而使中韓宗屬關係之變質。第九章為全書之撮要。

本書原為一博士論文。作者的指導教授劉廣京 (Kwang-Ching Liu) 先生在書前寫了篇十四頁的前言，指出本書的優點，及有待改進之處。因之，進一步的評論實非易事。幸好，這本三百七十餘頁的書中尚有不少啟發讀者深省，值得深思明辨的地方，對中文讀者而言，因有關此種著作甚少，也可作重點介紹。

本書是一本以韓國為討論中心的東北亞外交史。作者固然很重視事件演變的描述，更重視探討歷史現像背後的原因，而且往往多角度觀察。例如第一章討論朝鮮排外的根源，便涉及到宋代新儒學的影響，明亡後朝鮮的文化使命感，親明反滿思想，兩班士族在政治社會上的實際利益，面對天主教的危機感，文化上對日本的輕視心理，及對近代西方世界的無智等。例如分析李鴻章將朝鮮帶入西方國際關係制度 *treaty-system* 中的原因是：日本侵臺及俄佔伊犁的刺激，建海軍案在塞防海防辯論中失敗，在馬憂理事件交涉中體驗到西方均勢形式對中國的益處，馬建忠對西方均勢外交的報告——英國對俄土戰後交涉的干預使奧託曼帝國獲利，中國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略等。學者們一向以以夷制夷及均勢政策與李鴻章的對韓政策相比擬，然而作者卻在分析後指出，李策與二者均不符。

作者對於日本自幕末至江華條約之締結間，國內政治與對外交涉的互動，對韓外交角色的變動——目的或手段，有生動的敘述。這使得本書不僅是一析理的著作，也成為一善於描述的歷史。作者指出，維新日本向西方外交制度精神的認同，是東亞局勢轉變的關鍵。這對一九八一年閱讀日本總理鈴木善幸與美國總統雷根聯合公報的中國人是有很大幫助的。因為在該公報中，鈴木說日本是一西方國家。畢竟金教授是嫻於日本語言、歷史的日本鄰國人民，所以對日本的析論，較其他英文著者為多，而且精闢。

東亞世界秩序的演變是作者考察的中心，所以對此多有突出的看法。本書之所以稱為東亞世界秩序，是因為：李氏朝鮮王朝的始祖李成珪受明朝册封為朝鮮國王，日本足利幕府將軍也受封為日本國王，二者平等建交；而且日本的對馬藩同時也持有朝鮮國王頒給的印信；琉球受中國册封，而明末起又朝於日本薩摩藩。換言之，整個東亞是一張封貢關係網絡。西方勢力東來後，雖然中國、日本分別與西方締結西方式的國際關係，然二者間關係仍以傳統觀念對之，所以中國在中日條約中不給日本最惠國待遇，而日本之侵韓併琉，雖係援西方的霸道主義，碾艦政策，但侵韓乃因傳說古代韓屬於日，故內政上王政復古，外交上也應如此，應將朝鮮置於日本控制下；併琉是基於薩摩藩對琉球的宗主權；且日本對中國的挑戰，也無非欲

取中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而代之。這些行爲動機或觀念，絲毫未逃出傳統封貢制度的臼窠。尤有進者，作者以爲毀廢封貢制度者是封貢制度本身。具體言之，法國、美國未能使朝鮮門戶開放，而朝鮮之所以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乃因中國之勸告，而韓美條約更是全由中國構思設計導演而成。中國原想朝鮮對西方開放後，一方面防止日俄對該國的侵吞，同時也保持住中國的宗主權。所謂宗主權是清朝對朝鮮以不干涉政策（non-interference policy）爲基本原則與規範，所有行爲均屬禮儀性、象徵性、道德性（ceremonial, symbolic, moral），朝鮮除禮儀性的從屬（Ceremonial submission）外，內政外交完全自主。由於西方的條約國際關係制度與封貢關係制完全不同，一八八二年韓美條約締訂後，尤其因壬午事變中國派兵駐韓後，封貢關係完全變質，和睦、禮敬、關愛之情誼爲不信任、猜忌、反感所代替，同時權利、貪慾、國家利益主宰了兩國關係。這是舊制度的破滅。

由上所述可知，不干涉爲作者對宗主權的惟一解釋，也是本書的理論架構基礎。不過根據 M. Frederick Nelson 之 *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 Asia* 之所述，根據全海宗「清代韓中關係的一考察」，及我所著「清韓宗藩貿易」，不干涉並非清韓關係的真像，並非滿清對朝鮮的基本原則和規範。全海宗說一六三七至一六四四是清朝對韓威壓期，一六四五至一七三五爲緩和期，一七三六即乾隆元年後爲惰性化時期^①。我的看法是，在司法、軍事、外交等方面，清廷對韓有一定程度的干涉，絕非僅止禮儀。清廷對朝鮮的干涉固有限度，如從未更易國王，然皇帝干涉的多寡及程度，全由他決定，無固定客觀規則可循^②。作者將乾隆元年而後中國對韓關係的惰性化期情形當作整個滿清時代的中韓關係實質，妨害了歷史的解釋。例如他一面承認 Nelson 所說一八八二年後中國在朝鮮的行動，仍舊是傳統中國宗主權的標誌，並未爲朝鮮與西方的關係所影響，一方面又說中國宗主權其後完全變了質^③，就是因爲他爲了自圓其不干涉原則的假定，故須將中國勸朝鮮開放，主持韓美條約之談判指爲干涉，只有如此方能得出變質的結論來。然而這假設是不成立的，明末中得援韓抗日，戰後也駐軍數年，並未使宗屬關係變質。不僅如此，明鮮關係因中國軍援朝鮮，即金氏所謂干涉而益增親睦。可知增進宗屬關係不在不干涉，而在干涉，爲朝鮮的利益而干涉。明末朝鮮人也知道明人之出兵也是爲保衛其京畿，不全爲朝鮮，但他們並未因此而減少其對明的感激之情。以此例彼，

① 載「東亞文化之比較史的研究」，漢城，「潮閣」，1976。

②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 43-52 宗藩關係之分析。

③ 見金著頁 349。

恐怕清人壬午出兵並不一定構成兩國關係的重大障礙。作者認為李鴻章代朝鮮談判韓美條約為自命為全權代表，為對朝鮮外交的干涉。事實上鴻章此舉乃因朝鮮陪臣金允植奉國王密諭請其「代為主持」之故^④。囚大院君一事，現代韓國史學家同聲譴責為干涉內政。事實上，清廷所承認並負責扶持者乃朝鮮國王，非朝鮮政府或任何個人。因之，凡不利於國王者，清廷一律刈除，國王父親也不能免罪責。為大院君打不平固無不宜，然將置國王於何地？此外，作者以為一八六〇至一八八二的東亞為東西兩種國際關係制度重疊演變期，本書的目的即在觀察此演變形式及過程。不過，如不將不干涉定為宗屬關係的原則及規範，則此演變期限應延長到甲午中日戰爭。從一八八二至一八九四年纔是東西兩種制度的重疊交爭時期。

在英文著作中，本書是有關此一主題的最新研究^⑤，所以它和杜婷娜 (Martina Deuchler) 的「儒士與夷使：韓國的開放，一八七五——一八八五」一樣，參證之資料至為廣博^⑥，新刊舊作均在其蒐羅之內。尤可貴者，如同劉廣京先生在前言中所指出，作者論事無偏見。這是寓美韓人與住在韓國國內學者不同之處。要求歷史研究者在其著作中不帶時代環境及泥土氣味，是過分理想。如同其他韓國學者，本書作者對於同一類的資料，有的能牢牢的把握住，有的便忽略了。我認為滿清官員說朝鮮內政外交均行自主，和朝鮮官員說他們不要和西方往來，因為中國禁止，其用意一樣，均在設詞推拖。然而前者廣被徵引，後者尚無人發揮其意義。

作者鑄字遣詞的創新力很強，如稱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外交政策為維新外交 (re-orientation diplomacy)，名朝鮮對西方的深閉固拒為排外主義 (exclusionism) 等。造詞固工，然觀念則均自西方人立場出發。孤立 (seclusion) 一詞亦復如此。Ronald P. Toby 在重新檢討江戶幕府時代的日本的「鎖國」問題時說，就東北亞諸國而論，江戶日本與中國、朝鮮、琉球均有關係，而且此關係的密切程度較壬辰朝鮮之役以前更強。這種情形自然不能稱為鎖國 (seclusion) 狀態；所謂鎖國全是西洋人的看

④ 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頁 23。

⑤ 為供中文讀者參考，列舉重要的專書於下：

M. Frederick 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 Asia*, 1945.

Hilary Conroy,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1868-1910*, 1960.

C. L. Engene Kim and Han-hyo Kim,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1967.

Frederick Foo Chien, *The Opening of Korea: A Study of Chinese Diplomacy, 1876-1885*, 1967.

Mortina Deuchler, *Confucian Gentlemen and Barbarian Envoys: the Opening of Korea, 1875-1885*, 1977.

⑥ 參閱本刊第八期頁 295-299 筆者書評。

法^⑦。十九世紀的朝鮮與中國及日本均有關係，既不孤立，也構不成排外。因為縱使中國不算外國，至少日本是外國，而日與朝鮮保持往來。因之，所謂排外實即排西。朝鮮稱壓迫天主教為斥邪衛正，他們將新自外而來的西方與天主教看作同一事物，所以排西就是斥邪。日本極力西化，行西洋霸道主義，所以也在被排之列。百年來對中日韓習用的閉關、鎖國、孤立、排外等詞彙，近年來漸被重新檢討^⑧，雖未產生具體結論，然研究之際，似也宜加注意。

上述值得商榷之處，並無礙於本書為一本好書，一本值得好好讀的書。我謹在此向讀者推薦。

⑦ “Reopening the question of *Sakoku*: Diplomacy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okugawa Bakufu”, 載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3, No. 2, 1977.

⑧ 對於日本的想法，除 Prof. Toby 外，尚有田代和生 (Tashiro Kazui) 女士。對於中國，筆者在清韓宗藩貿易結論中有所議論。